

世界知識叢書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

麥帥下陸

著 R. E. Lauterbach 美

譯 華 碧 梅



世界知識社刊行

世界知識小叢書之二

麥帥陞下

著 R. E. Lauterbach 美

譯 華 碧 梅

世界知識社刊行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

麥帥陛下

世界知識
小叢書之二

作者

美 R. E. Lauterbach

譯者

梅 碧 華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上海(○)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 人民幣

元

一九四八年三月
一九四九年七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世界知識小叢書刊例

(一) 由於世界形勢變化的日劇，大家對於國際問題的興趣也日形增加。本社為適應讀者要求，特自本年起陸續發刊世界知識小叢書以補充世界知識週刊之不足。

(二) 本小叢書性質有如美國刊行之“*Headline Series*”。但其範圍除有系統介紹世界重要問題外，亦將包括歷史、地理、人物傳記、科學、及文化等各項。

(三) 本叢書篇幅每冊定為至少兩三萬字，最多不超過五萬字為度。

(四) 本叢書刊行不定期，暫定以十二冊為一輯，本年度擬出滿一輯至兩輯。

世界知識社謹啓

一九四八年元月

目錄

上篇：裕仁天皇：從神到人

- 一 裕仁的戰爭責任……………(一)
- 二 美國再造下的天皇……………(三)
- 三 廢棄神權勅書……………(七)
- 四 一套皇家生活的照片……………(九)
- 五 詩會……………(一五)
- 六 巡幸橫濱……………(一七)
- 七 神道教的典禮……………(二四)
- 八 不能算是革命……………(二七)

下篇：麥克阿瑟：從人到神

一	麥克阿瑟的信箱	(三〇)
二	無理的新聞檢查	(三五)
三	對美國記者的壓迫	(四〇)
四	日本的辯護者	(四六)
五	士兵們講說着的故事	(五〇)
六	一批離職的官員	(五四)
	譯後記	(六四)

上篇：裕仁天皇：從神到人

一 裕仁的戰爭責任

在一八六八年以前的幾世紀中，天皇並不是日本的真正統治者。在宮廷幕後的人物稱爲將軍。在明治維新以後，天皇變成了在名義上和精神上的統治者。他還是被幕後這一系那一派的手指操縱着的。

在戰前，裕仁也並不例外。他知道內閣以及陸海軍的擴張主義者的計劃。他是否批准，差不多是帶有學者風度的，但也並未完全如此。他能够阻止他們嗎？佔領開始以後不久，當裕仁手裏拿着絲質禮帽正式訪問這位新的「美國將軍」（Yankee Shogun）的時候，麥克阿瑟將軍問過這個問題。裕仁答道，如果他反對戰爭，「他們」——指軍閥和財閥——就要換一位天皇了。他後來又對另外一個美國人解釋道，他必須批准作戰，因爲「與國族渾然一體的日本天皇不能拒絕其要求。」

無論官方的說法是怎樣，裕仁完全知道戰爭計劃，並曾予以批准。他是否在他的內心上秘密地反對過這些計劃，是和討論希特勒是否誠實一樣無聊的。生命的喪失以及世

界歷史的最後結果才是算數的。

給戰爭罪犯審判所找得的負有罪責的文件，從來就沒有公佈過，這些文件確斷地證明裕仁是參加了準備作戰的每個步驟的。近衛自殺後所出版的回憶錄敘述軍人拒絕把他們的計劃向他的內閣宣露，但天皇允許使他（近衛）知道。聯合艦隊總司令兼裕仁海軍顧問豐田將軍曾被詢問道：「天皇在上頭知道攻擊珍珠港的計劃嗎？」豐田答道：「是的。所有的海軍計劃都曾經奏請批准。」

整個作戰中，裕仁每天召集各總司令舉行御前會議，並且聽取進展和戰略的撮要報告。宮內大臣說，在戰爭過程中，天皇是日本消息最靈通的人。當對於任何神志清明之人（神志清明是神志清明）雖然他的父親是死在神經錯亂中），顯然戰爭是失敗了的時侯，裕仁召集了一次最高作戰會議。這個萬能的集團，包括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加上帝國參謀總長和海軍作戰課課長，曾被垂詢決定是繼續作戰還是結束戰爭。據近衛回憶錄所載，在討論之後，三個人主張戰爭，三個人贊成和平。

當時裕仁決定不要和平，但也反對戰爭。據近衛所記，天皇說無論從局勢的那一個角度去考慮，繼續作戰是不會有成功的結果的。他告訴他們說：「所以我已決定下令停戰，因為我不能忍受要想到我的千百萬人民的喪亡，也不願被稱為世界和平的擾亂者。」

要把那些在長時期內我曾倚重而且是我身體的一部份的臣民交與盟軍當局，對我是十分爲難的，但是我已決定忍受這無可忍受的，並且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條款。」天皇投降詔書製了一張留音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早晨廣播出來，雖然還有些少壯軍人企圖在送往播音室的途中奪走並毀壞那張片子。投降勅書的感覺是日本在解放落後的亞洲的未成功的企圖中，打了一個正義的戰爭。譬如，裕仁「對我們在東亞的各盟國，曾不斷與帝國合作解放東亞」表示了「最深切的遺憾」。這個勅書是天皇最後一次的「自由言論」，將來對於復活的日本，會有不少的意義。巧妙的宣傳一下，對於那些未被美國人征服，也沒有在軍事上失敗之感的駐屯台灣、朝鮮、中國和滿洲的精銳師團的萬千復員士兵，會有特別的意義。

二 美國再造下的天皇

有影響力量的日本人是從來不會沒有計劃的。在美國人登陸之前，他們毀滅文件、更換官僚以及秘密警察的官員，因而他們能够避免責任、秘藏財富、改變銀行和企業的統計。大家同意「不可忍受」的失敗的基礎是保存天皇。波茨坦宣言適應了那些計劃。一個新的將軍會來拉緊皇家的絃索，但將軍們不能永遠長存，佔領軍也不能永遠長在。

有一天，將軍是要走的，但——如果他們的計劃成功——天皇必須保存。是裕仁或是太子明仁，都是無關緊要的。

允諾了這個重要的考慮，日本人就願意接受一切了。在十六世紀，蘆川將軍不也會對中國的明朝皇帝在口頭上臣服，並且接受了「日本國王」的卑微稱號嗎？因為作這麼一個鄙賤的角色，對日本的寡頭政治是有利的。將來——十年、廿年、三十年——他們就能够重握權力，不是反抗天皇，而是反抗他的議員。當薩摩地方人民起來反抗的時候，是因為天皇聽從了不良的進言，這一八七七年的事情不是一個模型嗎？這是長期的看法。天皇制度同時也是準備了反抗人民的飢餓與憤怒、反抗暴力改革與社會革命之可能的屏障。

盟國保存天皇有許多正當的理由，其中有：保持盟國的生命、維持穩定、阻止他變成一個殉道者。這樣決定之後，我們也換來了抵補可能的長期損失之危險的不可否認的直接收穫。邏輯是脆弱的，利益是大的。在一方面，保存了天皇，因為他的名字和命令有如此的權力和影響，他才能够使武裝對抗終止。在另一方面，他被免除了戰罪，因為他沒有真正的權力和影響。

裕仁將永遠是有潛在性的權力的；在錯誤的方面，也是有潛在性的危險的，除非日

本的再教育立刻毀掉要拔除的，並且建起要種植的東西。天皇制度的禍害不是存留在裕仁他自己身上，而是存留在日本人民的頭腦中。不管盟國作了多少要廢除天皇的宣傳，農民還是認爲他是複雜的日本家族制度的首長。天皇還是萬父之父，還是國家的象徵。五年、十年、或十五年也不能滅絕這種感染甚深的觀念。

佔領的第二年，在「語言國際友誼協會」的發起下，東京的一個街角上裝飾着一個大標幟。日英對譯的兩句問話和答話寫在佈告牌上。第一句也是最重要的，問道：誰案是世界上最可可怕的人物？答道：天皇陛下。第二句：什麼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東西？答是：原子彈。新的東西加進了日本的政教制度，但舊的東面還是依然存留。

美國將軍及其官員可以再造一個有血有肉的天皇。裕仁必須在他的前無人知的財富上第一次交納所得稅了。因爲他是極端吝嗇的，這不會使他快樂。他必須與來訪的外國記者、教育家、傳教士以及政治家談話。他和皇室人員過日子必須在戰時高額的八千九百獻金中削得僅餘一千四百。據日本報紙報道，此種削減表示「維持皇室最少的必需」。皇室在一九四七年還可以花用正常收入的三分之一——這還大大的多於撥供爲了實行新憲法而建立的各機構經費的總數。裕仁還能够在他的試驗室裏工作，進行海洋生物學的試驗、收集鐘表、研究基督教、讀達爾文和林肯、崇信他的祖先、以及作詩。他能够接

見人權協會的羅吉·鮑爾溫 (R. Baldwin) 和少年村的佛蘭納干 (Flanagan) 神父，參觀足球比賽，但不能在選舉中投票。在這以下，他還是一個搖着一面假旗子的小人物。他是無辜的和卑微的，樸素的和保守的，受驚的和危險的。

盟軍總部並非完全不知道天皇制度的固有危險。所以盟總忙於把天皇以及他所代表的制度的公開面目揭露出來，把這一個莊嚴的小神改變為一個含羞的民主份子。

盟總建議裕仁必須成爲對人民更可親近的。有一個美國上校問我道：「如果他們能夠見他一次，什麼人還能相信他是神聖的？」勉勉強強，一個胆小的開端造成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皇室安排了裕仁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在皇宮大院的一個角落裏，六個採訪皇室新聞廿年的（但從來沒有親見過的）年長記者，在和一個指定的侍臣談話。忽然，在花園小徑上，宮內大臣和天皇來了。天皇在驚愕中像一個受驚的半羊半人的神仙那樣接待這些記者。他們低身鞠躬。大臣介紹。天皇談了談天氣與和平，然後走了。

記者們，顫抖着，魚貫而出。侍臣警告道：「不必寫什麼新聞。」

這是微小的統治者的煩惱的月份。他的海陸軍大將，末後是他的朋友以及顧問都開始進入巢鴨監獄，等候「反人道罪」的審判。他的世交木戶候爵、近衛和梨本——都是與皇族接近的——都被送入監獄。小天皇又命令他的顧問向盟總探詢廢黜之事。盟總說

不會的。澳大利亞人、新西蘭人和蘇聯人的壓力要提名裕仁為戰爭罪犯，恐懼就增加了。但麥克阿瑟並沒有這麼辦。他能够永遠利用他作爲一個威脅。麥克阿瑟說過，「天皇是在我的手掌上坐食的。」這令人想起紐約時報前駐東京記者修·拜亞士（Hugh Byas）關於「天子」的合適的觀察。拜亞士有一次寫道：「如果裕仁是在美國度幼年生活，有人告訴他菠菜對他是有益的，他就歡喜菠菜了。」（註一）

老年的首相幣原在議會中站起來爲天皇辯護。在美國包括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對於民主完全是對的，他說，「但在日本，就必須在天皇之下行使。」

在珍珠港事件那時，我告訴曾任日本駐華盛頓的大使年老的獨眼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說我沒有想到裕仁會交付審判。他緊抓着我的臂，說：「你不攻擊天皇，我很高興。我曾經担任過天皇的海軍事務的私人教授，我感覺到對他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就好像是對我自己一樣。」野村也沒有被控爲戰爭罪犯。

三 廢棄神權勅書

（註一）此句引自拜亞士所著「日本的暗殺政治」一書，我國有文摘社張起衡譯本。

一九四六年元旦，又實行一次更大的步驟以改裝天皇。裕仁宣佈他並不是真正神聖的，宣讀的聲音像是得到了麥克阿瑟施捨的一個小惠。當他第一次接近着要人性化他自己，他致書麥克阿瑟，說是要剝奪他並沒有的什麼事物，對他是「一個個人的困惑」。送回來的答覆說深信天皇繼續認為是神聖的，對於日本在海外的聲望是壞的。

小人物也曾說：

我們曾……毫不畏縮地進行剷除過去時代中錯誤領導的實施……我們與我國人民之間的紐帶……並不是依據傳說和神話。他們未曾被虛假的觀念所預示，說天皇是神聖的、日本人優於其他種族、以及命定要統治世界……天皇不是一個活神。

日本公衆對於這種神權之否定論的反應，是並不覺得怎麼有革命性的。在美國，這種棄權說得到了報紙上較熱烈的歡迎。如果比起洛克斐勒 (John D. Rockefeller) 突然對美國人宣佈他不再是世界上最富的人來 (註二)，對日本人，那也是沒有更多的可以看得見的效果的。美國人還是要想到洛克斐勒並不是他們這個階級的人。關於神權的勅書公佈後一年，寫過廢除國家神道訓令的監總宗教組組長彭斯 (W. K. Bunce) 觀察了一下，很憂鬱地說：「我們儘力告訴日本人天皇不是神聖的，但他們還是把他當作是

(註二) 洛克斐勒是美國的煤油大王。

神。」

日本時報安詳地、暗自吐舌地、評論神權勅書並不是「表示許多外國人所想的史無前例的改革，而是真正地表示了在一個暫時曲解的時期以後，返回到日本真正的傳統上來。這不致引起什麼驚奇，所以也祇是一種平靜深切的滿意而已。」

在我訪問過的東京的市民中，都在典型的日本方式中，突然發現他們自己並不真的想着天皇是神聖的。他們讚揚天皇的坦白與誠實。有些人指出，他們相信神權是隨時代而變遷的。或許這次的改革也是「暫時的曲解」，像整個的佔領一樣——是一個惡夢，當美國人歸去的時候，每個人都會從夢中快樂地醒來。

最強烈的也是敏銳的評論是來自共產黨方面的，他們差不多是孤立地繼續攻擊人性的或神聖的帝國觀念。「天皇否定神權的宣言表示了由於國際情勢的壓迫和人民的攻擊，他是被迫退讓了……好像是一隻章魚在飢餓的時候吃起自己的觸角來一樣。」

四 一套皇家生活的照片

神權之剝奪的煩惱給了我新的希望，我可以給「生活」週刊寫一篇裕仁的故事了。和許多人一樣，幾個月來我都在尋求一次覲見。一個記者總要給天皇送點禮品，他不吸

烟不喝酒，按着他的要求，爲了這次訪問，送了他足供一星期吃的巧格力糖。覲見之外，我請求允許「生活」週刊的攝影記者艾森斯達特（A. Eisenstaedt）同來拍一套皇家非正式的圖畫新聞。

我求一位皇家官員來努力其事。他化了不少錢款待皇宮官員裏的上司和內閣閣員。許多理由都提出來反對「坦直的」圖畫新聞。這要破壞傳統。日本人民並沒有準備此事。有人還來問我。幣原首相的一個助手建議試試最後一次的反對，就是把我這個普通的駐東京記者或分社主任提陞一下。「生活」週刊社行了個方便，把我暫時陞爲遠東部編輯主任、特派員、經理。

我被請先寫出關於記述天皇所需要的那種照片的大綱。我們謹慎地對天皇的官員解釋道，這是不可能辦得很準確的，除非是知道皇家日常活動的各方面。那位助手顯然毫無準備，或許討論此事也太煩惱。在絕望之中，我打好一份草案，說要拍的是天皇把太子明仁抱在膝蓋上給他講故事，聽女兒彈鋼琴，推孫兒的搖車，在圖書館裏啃嚼一本好書，在生物試驗室裏瞄視顯微鏡。另附一信，大意說，這份草案上所列舉的足以代表「生活」週刊給一個大人物所規定的公式，並請求準許拍攝圖畫新聞「向全世界人民表示天皇是怎樣真實地生活着的。」

艾森斯達特從來沒有進宮去拍照，他和我都很失望。但是，一天下午，日本最大的圖畫新聞機構太陽攝影社的經理急急約我前往。把窗簾拉下，又把門關上，經理才說他已經幹了一次新聞史上的最大的事情。催促他幹快說完全部經過是白費的。在高聲飲茶之間，他才拉扯得很長地發表出來。最後，他才擺出他的大結局：歷史上第一次允許攝影師拍攝天皇陛下的私人生活。他行了許多禮節，才從壁上保險箱裏取出照片放在我的面前。

大約有四十幾張。僅僅提供了一個示例的我那份綱要已被詳細描寫。事實上，這位日本人還想到了被我忽略掉的若干有效的細節。譬如，在圖書館裏的一張，顯示天皇正在閱讀紐約時報，室中一角林肯的半身銅像清晰可見。

當我斷言這套照片是動人而堂皇，但無疑是不真實的時候，經理被激怒了。他的兒子們也是拍攝這些照片的攝影師。他自己穿着禮服，戴着禮帽監督全部攝製工作。他們費了一個月中中的幾個星期日，才照好這套照片。

皇室與世人接觸了。能證實這些照片的真實性嗎？當然，爲什麼有人要懷疑呢？這些照片不是「恰好滿意」的嗎？我指出這些照片都是密切地照着我的綱要拍攝的。皇室人員直瞪着我的眼睛，問道：「什麼綱要？」他和他的同事們，那時倨傲地堅持說，他

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什麼綱要或建議的草案。他們說這些照片表示了皇家生活的真實情況。我想他們是相信的，雖然我並不相信。

皇室頒發指示說這些照片必須不在日本發表，因為這些照片會「震駭」日本人民。「生活」週刊發表了最好的幾張以後，複製的幾張在日本放行了——有幾張還是沒有刊出。皇室規定日本報刊不能發表皇家吃飯的一張（「因為食物都陳列在桌上」），或臥室的一張（「因為大多數日本人並沒有鋼琴」）。我和一個東京著名的編輯談話，我問這樣的檢查如被抗議，就會怎樣。他說：「啊，不，這是值得讚揚的檢查。這樣的檢查僅祇是要告訴人民，天皇並不比他的人民過得更好。這是在民主名義之下的檢查。」後來，我和參與攝製的兩個攝影師談話，我發現我所看到的這四十張照片老早就被檢查過了。樞密顧問官毀掉了幾張裕仁穿制服的照片。美國人祇能看見他是一個無害的小人物。

攝影師們都感覺到他們已經到達了他們的生涯的高峯。一個人說：「除非我們再拍麥克阿瑟，我們也沒有什麼事情好做了。」當他們開始皇宮工作的時候，他們發現每一個人都「僵直而薄情」了，因為他們常常要裝模作樣的拍攝正式的照片。但是，天皇看到這樣也不以為然，說「我們都很自然，你們也隨便一些吧。」當攝影師聽到了天皇直

接的話，才在驚惶失措中鎮定下來，開始工作。太子問他的父親道：「我做什麼？我裝作怎樣？」他的父親說：「就照你平常那樣。」

天皇和他的家屬住在有八間房子的從前貯藏皇家檔案的房子裏。從前的東京皇宮，祇有一部份是被B-29型飛機在空襲中炸毀了。一九四四年十月間，有三千多個勞工，許多是朝鮮人，被送往長野縣的松代去，為皇家建造一個地下的方形堡壘。在建造一條通往裝置冷氣的藏身所的一哩長的隧道時，死了六個人，按規定要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完成。看見過兩間地下室的人們斷定如果不談實用，在莊嚴華麗上，裕仁的一定是超過希特勒的。裕仁從來沒有進去過。如果他進去了，他或許對這豪華的設備會大感不快，因為他是享受過奢侈的樸素的。

當攝影師看見放在寢宮（他們是不能進去的）外面地板上的拖鞋穿破了的時候，他們號泣起來了。他們告訴我：「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你看天皇為他的人民犧牲了。」次一個星期日，當攝影師重進皇宮的時候，他們看見拖鞋已經補上補綻，他們又哭了。

我把這些照片送交「生活」週刊，附帶說明道：「這套照片自然都是勉強的對外聯絡的運動，以資證明天皇是一個好好的奇裝異服者，生活得很簡樸，所以他是民主的，

是必須保存的。」

人性化裕仁的運動也擴展到日本的出版物上來。在一次破例的高松宮訪問記中，報紙上用的標題是「天皇，我的哥哥。」他要記者深信裕仁「是極不高興的，當他看見了報紙登出錯誤的時候。」他對於正確的是很高興的。高松說：「如果他是這樣，人民就會知道真象了。」

「說玩高爾夫球吧，我哥哥是極守規矩的，」高松滔滔不絕的說下去，「同樣的，對於國際法的尊重，也是深切的。他努力要在各方面弄得十全十美，平常人祇是搞搞局部。」高松感慨繫之地，凝想着許多善良都集於一身。「有一次，當他兒時患病衰弱下來的時候，」這位天皇的弟弟回想着，「玩具都給拿走了。把他送進另一間屋子裏，他捉了一大堆小蜘蛛，自己取樂。」

「他是很關心別人的。當我傷風的時候，他常常問起我的健康。」

高松結論道：「他是一個和平的人。」

又過了一年多，天皇與皇后第一次聯合接見日本記者。記者們開始小心翼翼地問到宮牆裏面所種植的稻米的生長情形。「我不大知道稻米，」裕仁神經質地答道，希望停止提出有關這個項目的特別問題。「皇宮裏面長着稻米，可以讓我不忘記農夫的勞動

和耕種中的痛苦。」

後來，天皇陛下對這些充滿同情心的記者們說，他們也是和人民一樣痛苦的；他們不能定製新衣服，他們吃米的代用品。記者們問道：「天皇最喜歡吃什麼？」皇后答道：「天皇什麼都吃。」

五 詩 會

插進這些新式的誇大宣傳，舊人物看得到許多宮廷的「連續風俗」並沒有改變。一九四六年一月的第三個星期，皇室所有官員集合在宮內府的白牆的寒冷的臨時觀見廳裏，舉行每年一度的詩會。從前是在宮中的鳳凰廳裏舉行，現在已經被毀了，詩會由天皇主持，他坐在金葉幕前面的架高的低台子上。他旁邊是太后。在這間古老的鋪着玫瑰花蕾地氈的廳裏，每人都拿着一張圖樣，上面註明每人在儀式中應該站立的地方。

在這寬四十呎長八十呎的廳中央，站着詩會的參加者，都穿着條褲和早服。

戰前，大約要提出五萬首詩來。一九四六年祇有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二首。再加上裕仁的詩，選出五首朗誦——宮內侍臣一首，太后的宮女一首，加上三首由普通人朗誦。讀詩是按照着作者的重要性排定次序的——太后的宮女排在倒數第二，天皇最後。

裕仁的詩是用毛筆和墨墨親手寫的。按照風俗，男人要用一種叫做「大高檀紙」的白色吸墨紙。女人用深紅薄荷香紙，或用紫色厚紙，以「調和色彩」，並按季節決定。以呈函送來比賽的詩，都由名書法家抄錄在羊皮紙上。

詩會要開一個半鐘頭，會後所有各詩都呈交裕仁。那位繼承父業的高大的、愛美的皇家詩會書記解釋道：「這是極大的光榮，也是義務。」他告訴我，他是站着作詩的。他說：「除詩以外，人民不能向天皇送什麼禮，所以這件事情才是很重要的。」

從前的日本天皇寫出來的詩，都是要表現什麼傳統的教儀，其中都是極可尊敬的無聊。但裕仁登基以來，每年提出來的十七音節詩，都在說明他是一個愛的真正勞動者。日本人民要看看他的詩句，懂得裏面的難以捉摸的意義，就得研究一下詩選的皇家譯意。珍珠港事件以前，天皇頌揚和平的觀念，他的顧問（掠奪者）正在猛力地準備戰爭。

麥克阿瑟來的第一年，裕仁在「松樹之雪」一詩中勸告其人民：

要像那剛毅的松樹

永遠不改變顏色

雖然帶着落雪

麥克阿瑟部下的人員在這首簡單的小詩中看不出有什麼奇怪或不吉利的東西來。但是日本人和研讀日本文化的學生是可以看見更多的東西的。在表面上，這首詩是勸告日本人在災難之下振起精神來。但，也能說出戰敗的重荷是暫時的，日本人必須不改變理想；或許在社會不安的春季中，佔領軍是會溶化的，像那落雪一樣——留下的皇家傳統依然是青翠而壯大的。

六 巡幸橫濱

大約是在舉行詩會後的一個月，也就是廢棄神權以後的七個星期，麥克阿瑟所批准的天皇民主化的次一個步驟開始了。自從停戰以來，裕仁祇跨過兩次二重橋（註三）；一次是向麥克阿瑟將軍致敬，一次是乘火車到京都，祭告皇室祖先戰事已經結束了。自從他被外界偷看了幾眼以後，裕仁已經脫蛻了他的神權。一九四六年二月的第三個星期，新的裕仁穿了一件牛津式寬襟的灰色外衣，戴着一頂珍珠色的帽子，看上去像是坐

（註三）東京皇宮正門前，有一水池，中蓄鯉魚，類似中國的護城河。池上一橋叫做二重橋。

在頭上而不是戴在頭上的，一件黑色西裝便服，藍色內衣，白領子，不鮮明的花條絲領結，他出巡去看人民了。

上午九點，一如預告得那麼準確，一輛黑色的大汽車從宮門裏泰然自若地開了出來。天皇畢直地坐在後座上，並不左顧右盼。他的車往右一轉，其餘四十多輛車就準備往右轉——其中包括二三十輛黑色吉普車，上面裝着外國記者和攝影記者，他們都在熱心於第一次遇見的日本統治者。從東京到橫濱的大道上，有一片被炸彈炸毀的荒地。穿過他的厚玻璃眼鏡和擦亮的車窗，裕仁的眼睛集中地看着這個國家毀壞的程度。在顛簸的路上，他看見了他的人民：衣衫襤褸，顫抖着，蹣跚着。他們向統治者的奇形怪狀的馬隊敬致着迷亂的敬意。

在橫濱附近的川崎電廠蘇澳分廠那裏，裕仁從車子上直挺地走了下來。雖然這個曾經是大工業的都市距東京不過十八哩，這還是裕仁十七年來的第一次來到這個區域。電廠職工立正站着，面孔上帶着星期日的笑容。以快捷而嫻娜的步姿，裕仁的尖頭黃褐色鞋子踏入一座像帳篷似的亭子裏去。他不穩地走着——像是一個沒有十分復元的殘廢者踐踏在一個鋪滿雞蛋皮的小徑上。他站在一張桌子後面，桌上放着一些鮮花，在美麗的玻璃瓶子裏，有兩份氮肥料的樣品。當天皇在背後握着沒有戴手套的雙手的時候，電廠

總經理朗誦着一篇長篇報告。攝影記者都挨得很近。裕仁雲着眼，睨視着，臉上的肌肉跳動着，點着頭。川崎市長接着那位工業家，用他謹慎調好的聲音，宣讀另一篇報告。攝影記者現在差不多都和玻璃瓶那樣接近天皇了。天皇舐着嘴唇，雙足移動着，兩手鬆開，上下挪動着向後傾斜的下巴。

站在我旁邊的是金澤縣知事，戴着白手套的手拿着他的高禮帽。他對我耳語道：「這會鼓勵人民，對於他們的精神是很好的。」

市長讀完了，後退，鞠躬。裕仁的嘴唇動了一動。記者們更走近一點。天皇說：「啊，好。」

後來，陛下就巡幸在這百分之七十五都被炸燬了的曲折破碎物中。天皇把右手放在帽邊上，機械地一上一下，像是一隻在繩索上的猴子。他神經的站在一個工人面前。記者和攝影記者擠在皇室官員之中。

天皇有禮貌地問道：「你在這裏作了幾年了？」

「十五年。」

天皇說：「啊，好。」

「啊，是的。」工人結說着。

按着粉筆的記號，裕仁走到一個老婦人面前。「你有親戚在廠裏工作吧？」

「有一個妹妹。」她訥訥地說着，眼睛看着地上。

「啊，好。」天皇說：「你作得賣力氣嗎？」她的臉很醜。「是的，我盡力作工。」裕仁把帽子戴到頭上，挺直地躬着身子，說：「啊，是的。」就走了。

一個穿着制服的天皇的助手，負責使此次巡幸要按時間表進行，手裏拿着一張印好的秩序單。另一隻手裏拿着一隻似玻璃的軟質匣子，包着棉花，裏面放着一隻懷表。我問他爲什麼那樣子拿着這隻表。他答道：「防止灰進去和震動，天皇是要用這隻表的。」

在第二個地方，裕仁視察了日產重工業工廠，裏面都是美國厄爾、辛辛納提、匹次堡、多利多、克利夫蘭來的機器。爲了準備天皇從東京來訪，這家工廠刷洗了三天。路徑上鋪着黃沙。那雙尖頭黃褐色的鞋子小心地走過以後，園丁就把它鋪平，像是一個麵包師在餅上塗糖皮。如果有人以非帝王的印痕陷了下去，他們就自願伸手把它覆好。當裕仁走回汽車的時候，他發現有幾百個美國兵圍着他，大都拿着照相機。即便這位快步的小人物走進了他的一九三六年式的汽車裏，毫無笑容的司機砰然關上了金飾車門以後，他們還是把照相機的扣門打開着。一個美國兵走來對我說：「喂，他活像一個東方的卓別麟——看他那走相。上帝啊！」

吃了一匣子從宮裏送出來的午飯、煮雞蛋和乾酪夾餡麵包之後，裕仁又走了出來。他有點倦容了。在稻存殘廢軍人收容所裏，他跟着嚮導從這間髒屋子走到另一間髒屋子，被帶來帶去好幾次。受難的人們鞠躬，一隻腳後偏着，有人流着不怕羞的眼淚。在一間黑暗而寒冷的屋子裏，有一個裝着木腿的復員兵士。裕仁的牙床牽動着，他的肩頭好像比平常抬高了些。他把帽子放在胸前，對那人的妻子說話。

「你丈夫在那裏受的傷？」

「在菲律賓。」

「啊，好。在菲律賓。你們有孩子嗎？我真抱歉。你們在這裏住多久了？這地方可真冷。但就會暖起來的。我希望你們會高興。」這是裕仁那天最長的說話。那女人訴說着。裕仁突然走出了那間屋子。

在橫濱營造所的屋頂上，裕仁雲着眼睛凝視着這座被毀的城市。他用雙孔望遠鏡看着曾經是忙碌過的海港。美國攝影記者圍着他。

我看見裕仁對這裏的主人側着頭，我就走向樓梯那邊去了。不知怎麼，天皇同時也走到了那裏。我往後退。裕仁也往後退。我用日語說：「請。」裕仁扣上鈕子。他有點像要睡覺——在非東方人看來，他那雙眼圈看來就像這樣。一秒鐘之後，我們兩人又都

走到樓梯口，又後退。正在危機之中，有一個担心的官員走向前來。「請，」他對我鞠躬，戴着手套的手指著樓梯。「不，我不能在天皇前面走。最好我還是跟著走吧。」我這麼說，看着裕仁。天皇動着身子；臉上還是毫無表情。

「如果你要，還是你先走吧，先生，」那位官員和他的陛下交換了一下陰鬱的眼光後，堅持地說。裕仁動着頭。於是我在天子之前，慢慢地走下四級。在樓梯底下，他走過我面前。「謝謝你。」他用純正的英文說。

裕仁跨過二重橋的七個鐘頭之後，他回宮了。那天，他比以前在街上看見了更多的人民，很多的人民也看見了他。從前，天皇巡幸的時候，他的車子總是在馬路當中開動，所有的窗簾都是拉下來的，所以沒有什麼凡人可以看見這位天子。

在天皇巡幸中，由我的翻譯幫忙，我和許多日本人談過，他們差不多都很高興天皇的新策略。有一兩個人說他們想天皇是「丟臉」了。如果是這樣，他會在他所獲得的善意中，撈回更多。裕仁知道他幹的事情。波茨坦宣言說，日本人民可以選擇他們自己的政府形式。裕仁是在實證他的選票。

他坦白地開始了他的活動，以便在麥克阿瑟的候選名單上保留天皇。不久以後，在麥克阿瑟的一份定期報告中，他宣佈天皇的賜宴已經獲得日本人民的好感。賜宴繼續舉

行。在鄉村中，好奇與憐恤之外還加上很大的敬畏與喜愛。

祇有共產黨提出了抗議。他們說明天皇的巡幸是要影響未來的國會選舉，以反抗他們，他們是唯一反對天皇制度的政黨，他們向盟總提出了正式的抗議。盟總自然是一笑置之。

天皇再接再厲地活動開來。在開往大部炸毀的水戶城的火車上，他寫了一首詩，參加一九四七年皇家詩會比賽：

日子的破曉有希望地籠罩在水戶城，
鐵槌的聲音清晰可聞了。

日本的學生愉快地領悟了這首詩，認為是天皇改正一九四六年小疵的標幟，並且「對於爲新的民主國家而工作的力量予以皇家的認可。」「鐵錘的聲音」無疑意味着象徵日本的復興。民主份子把它讀成「和平民主的復興」。希望恢復舊秩序的人們把它讀成「舊秩序的復興」。

裕仁作爲一個公開人物也常常不能有完全的成功。在去年春天的種稻季節，他突然在一個農村出現了。迷惑的農民深爲感動，相信天皇的來訪可以預兆豐收。有些人混雜着喜愛與憐憫笑了起來。天皇站着，偏促在不合適的衣服裏，等人家告訴他往那裏走。

但是，有一個領悟了的農民，注意到他孤疑的樣子，就說：「天皇不認識稻米。」

那年秋天，他更高興地按照舊方式慶賀日本傳統的感恩節：神嘗祭。天皇穿着大宴會的禮服，用聖水淨手，向祖先祭告新穀登場。後來，他虔誠地把收穫物的樣品放在神社的祭壇上：一小匣新米，幾隻水果，幾顆蔬菜，一瓶酒。

由於麥克阿瑟對於日漸增漲的不滿感到了焦慮，裕仁就在一九四六年糧食危機中發表廣播演說，他要人民「在貧窮期間，大家分擔責任。」日本銷路最廣的報紙朝日新聞在社論中說：「廣播演說沒有能够大大地感動人民……陛下就是日本歷史上所有悲劇的具體表現。」社論作者的粗鹵，被溫和地叱責了一頓，裕仁大為悲痛，他被激動得又寫了首一詩，這首詩主題是「起自我胸中的痛苦」。

七 神道教的典禮

在麥克阿瑟來後的第一年，他能够說「天皇是在我的手掌上坐食的」，而且是確實的，至少是在象徵上。在表面上，事情都辦得很好。在廢棄神權宣言之後，麥克阿瑟把美國報紙上大部份重要社論的剪報資料，都送進宮裏去。天皇大為高興他的被注意，好像是一個臨時女演員突然在開演之夜走上台去擔任一個太大的角色，不知怎麼還招徠了

一些觀衆一樣。大家都知道裕仁對於廢棄神權宣言的明斷有些疑懼不安；現在，從遠方博學之士的粗俗讚揚中，已經驅除了懷疑。他致書麥克阿瑟認爲新年的宣言是一個很好的觀念。

裕仁開始越來越憑靠了麥克阿瑟的勸告，越來越不顧宮中舊派和樞密院了。用一個很明瞭在此期間皇室情形的美國觀察家的說法，就是他們已經發展了「一種對麥克阿瑟將軍的強烈的、虔誠的感激」，他們認爲麥克阿瑟是他們的「救主、保護者、優勝者，差不多也是同事」。

在麥克阿瑟這方面，他對於裕仁也越來越熱心了，有多種多樣的說法是描寫他的，如「完美的小紳士」、「高爾夫球俱樂部裏引以爲榮的伙伴」、或「無害的理想家」、或「日本政府中最自由的人物」。麥克阿瑟或許開始感到裕仁是新生了，完全照着麥克阿瑟的頭腦轉動。當大吉大利公佈麥克阿瑟所鼓勵的日本新憲法的時候，他看見舞台燈光已經集中在他自己身上。麥克阿瑟批准舉行讚揚這個基本新文獻的慶祝會，他實際上就是讓天皇寫下了他自己的候選名單。以後，盟總對於此次的豁然大度懊悔了。這位受驚的小人物不願他自己的策謀，召請了幾位老議員來。他們沒有丟掉這次機會安排了一套代表舊日本的久被尊崇形式的佈景。

公佈憲法的日期規定了，竟落在明治天皇生辰假日的那天，這個名字是和從前的日本憲法有關的。天皇左右的一羣相信這是一次精明的心理上的步驟。其次，他們又得到了盟總的允許，可以公開崇敬日本國旗，從前是有限制的。第三，他們儘量用神道教的裝飾美化那個日子。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清晨，小天皇依照着東京的說法，穿着節日的袍子，正式向「宮中藏有皇室祖先靈魂的三大聖殿」祭告新憲法的公佈。首相吉田茂和其他政府高級官員都參加了這個典禮。這些事情的進行都沒有管到一種事實，就是麥克阿瑟的官員曾經下過命令廢止把神道教作為國教，尤其是禁止日本政府官員參加官方的神道教的典禮。

兩小時以後，天皇穿着深藍色的皇家制服，戴着白手套，配着十六花瓣的菊花大勳章，向議會吟唱一百四十五個字的勅書，宣佈公佈憲法。在這僅僅七分鐘的簡單典禮中，議會議員鞠躬卅六次。下午兩點一刻正，皇宮裏放出來六百隻鴿子，樂隊奏國歌，放了假的十萬羣衆一動也不動地等着，他們的陛下坐在一輛雙栗色馬拉着的敞車上，從宮門裏出來了。在「萬歲」聲中，天皇與皇后升上一個鋪着布的高台，接受羣衆發狂的喝彩和外交官的深深的鞠躬。根據官方的說法，他們之來是「分享人民對新憲法的快樂」。

裕仁很高興，他的好友也是如此。內閣也很高興，直到他們接到麥克阿瑟送來的強烈警告。軍部恭敬地提醒盟總注意一件事實，就是報紙上關於公佈憲法的新聞，清楚地表明是對於神道教儀式的小題大作，以及天皇所引起的發狂已經隱蔽了典禮的本意。盟總給吉田送去一份照會，告訴他要嚴防允准「不負責任份子重新影響天皇」。那位被誤導的天皇對於麥克阿瑟的不快，感到了難堪的悲痛；他聊以自慰地認為盟總不把過失當作是他的，而是他的顧問們的。

八 不能算是革命

付給保存天皇制度的最後價值，還不能預先說出。裕仁把神權放在一邊，以及適應在一種君主立憲制的隱蔽物中，好像不過是幾個月以前的革命。

日本通拉蒙特(W. C. Lamott)博士是在日本二十年的長老會傳教士，曾經指明：「天皇從一個接續祖先的繼承人的觀念，轉化為祇是國家的象徵，比起一八六八年天皇提陞為國家的道德中心來，並不能算是更革命的。」美國前駐日大使格魯(J. C. Grew)深為敬佩的「一位真正的偉大的紳士」牧野伯爵曾被問起新憲法對天皇有什麼影響。這位前內府大臣牧野答道：「沒有什麼。他原本是一位立憲的君主。」一位盟總負責官員

要一位記者小心一點，他說：「讓我們面對事實吧。」提到人民與天皇之間的關係有所改變的任何謠言，他說：「他們還是信仰他的。」

受到長期訓練承認力量與等級的日本人，已經被美國的象徵佔領大為感服。不是美國的國旗。他們滿意地注意到勝利的軍隊，也是在一個嚴厲的等級分明的團體制度之下統治者着的，在全日本祇有一個五星的天體，沒有人在他的背後說閒話。在他們的眼光中，所有盟國的經濟力量、軍事力量、道德威信是在一個高個子的穿卡嘰布的權威者系統中的一定形式和本質。今日和明日，他們的服從麥克阿瑟會使佔領的路徑更平穩，正如昨日他們盲目的服從天皇會使戰爭和投降的道路更容易一樣。

去年，有一天，我在東京問過一個姓石川的從前日軍的小兵，麥克阿瑟走了以後日本會怎麼樣。

這個青年的表情是很關心的樣子。他很敬佩麥克阿瑟。

他問：「他現在回去，馬上？」

我向他解釋我沒有想到他會被召回，但總有這麼一個機會，因為這位將軍年來一再提陞，他可以退休，或許他甚至也會死的。

「死？死？」日本人沮喪地搖着頭。「後來怎麼樣，請問？」

我不知道。沉默了一會，日本人愉快地笑了起來。

「如果馬上不會死，」他說：「麥克阿瑟的兒子可以代替他的職位，日本人民會很高興的。」

下篇：麥克阿瑟：從人到神

一 麥克阿瑟的信箱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廿八日，在東京最大的廣場上，站滿了幾千學童在慶賀神嘗祭。他們聽見日本的演說者對美國的謝意，對於慈祥、對於領導、特別是對於麥克阿瑟將軍。吉田內閣的一個閣員說，最高統帥「像一顆在這土地上放射着光芒的晨星，常常地照耀着我們。」

好像是無疑的，麥克阿瑟比任何美國人都更完全地抓住了日本人的幻想。在第一大廈美軍總部的外面，天天排列着幾百個熱心者，等着看麥克阿瑟出現在門外的那戲劇性的一刻，看他略一遲疑，碰碰他的志滿意得的軍帽，然後莊嚴地跨進那輻光亮的小轎車裏去。

自從美國人來到之後，有幾千個麥克阿瑟治下的日本人民給他寫信。這些未經懇求的意見之表現，比任何報紙社論都更好，表明了街頭日本人對新將軍的感覺。

日本人寫來的信是包括各階層的：有寫洋洋大文建議改變國家經濟的大學教授、有

承認犯罪的戰爭罪犯、有自己任命的偵探、妓女、農夫、小商人、學童。

雖然大家都相信麥克阿瑟是人，他們也不致找機會冒犯他的虛浮。致敬語常常錯把它放在神的一邊。他們稱呼這位將軍爲「殿下」，「吾人之最高統帥」，常常還有「麥克阿瑟元帥」。許多信件在開頭的一兩句中，就迅速說出對這位新統治者的祝辭。有一位記者把他歸類爲麥克阿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另一個人請求他「把你的家屬帶到日本來，做我們的總統。」有一個基督教徒的大臣，從監獄中寫來的信說道：「我們相信是主把你送來，把我們從這黑暗可憐的世界拯救出來。」

在麥克阿瑟信箱中，以及他自己所要知道的，最普遍的題目是有關佔領的。大家的意見差不多都是贊成的。有一個麥克阿瑟派，要求盟總使日本成爲親美的，並且保證「當美國與任何國家作戰的時候，每一個日本的青年人自然站在美軍一邊，並且要當義勇隊參加美軍。」另一個親美的人要求美國永遠佔領日本，而另一個人就主張把日本變成像夏威夷那樣的美國領土。一個又聾又啞的男孩子是殘廢不堪了，還在讚揚美國以及麥克阿瑟的一切，他還懇求將軍幫忙把他弄到美國去，他就能變成一個美國公民了。他向將軍保證道：「我絕對沒有日本精神，我是美國化了。」

當文人們把麥克阿瑟和他們自己的現在的領袖比較起來的時候，他們還是喜歡他

的。令人感服的主要理由是因為麥克阿瑟「工作直到深夜」，「出進不帶衛兵」。幾個槍手常在他身畔，但比起裕仁的皇家隨從來，這就好像不值得提起了。

麥克阿瑟從未發佈命令要求日本人給他寫信。但是當信件開始湧進他的大門的時候，他就允許日本報紙寫新聞強烈地暗示他不是不高興的。差不多三分之二寫給麥克阿瑟的信是英文的。另外三分之一較為嚴肅和冗長的信就要由一個特別翻譯部忙於其事。常常有這種情形，用日文寫的信是寫在厚羊皮紙上的，如果不破損，要長達十碼。二世（註一）翻譯者把一切都譯成日文。有一次他們翻譯了一部完全是講基督的宗教劇，直到有人指出這種短劇對麥克阿瑟是無聊的。

麥克阿瑟個人是喜歡保存這些熱心的信件。每天早晨，他的助手把每封信的兩三行英文撮要放在他的辦公桌上。麥克阿瑟相信這些信件可以幫助他體驗人民對於佔領的想法之趨向。早先，他規定最高統帥無須單獨地答覆來自日本人的任何信息。後來，他對幾個年青讚揚者憐恤過，也寫過信。

特別有關各部門的信件，都穿梭般地送交總部各組。需要回答的信就由下級官員有

（註一）二世是僑生在美國的日本人，意為第二代。

禮貌地正式答覆。

佔領延長下去，就有更多更多的寫信人向麥克阿瑟表示個人的盛意，並且向他尋求恩寵。有人邀請他參加一種角力遊戲，或者到京都去見識一次日本佛教文化的事情。信中常常附贈小禮品：水果、乾果、絲織品、手帕、用於祭祀的糕餅、手製的木盤。有一封信告訴麥克阿瑟，在車站上他可以得到一隻野豬，這是寫信人送去做為禮物的。野豬很大，可以裝滿一輛軍用卡車。麥克阿瑟慈祥地派去一輛卡車，把野豬送到一個軍人食堂裏去。還有許多獻品特別作了詩，畫了彩畫。一個六年級學生在寫給他的信中，附了「作為禮讚」的他所畫的麥克阿瑟、福特、杜魯門總統和一輛吉普車的畫。

但要求恩寵比表示盛意要多得多。三個法文教員要求麥克阿瑟利用他的「影響」，在一家東京旅館中給他們弄一間房子。一個獵人辯求着，允許他保留古舊的獵槍，以便捉兔子。一個作家要求對他的一部計劃中的歷史小說，給以官方的讚美。

符合於日本新獲得的言論自由，麥克阿瑟的信箱裏也加入了警告、建議、甚至批評。有一個人署名為「日本時報的一個記者」，把他的筆扭彎了送給麥克阿瑟，控訴道：

「我有光榮告訴你德富一郎（老記者，筆名是 Soho）是一個可怕的戰爭罪犯。他是可恥的日本軍國主義最壞的領袖。我相信他會很迅速地受到懲處。」

除掉大都贊成佔領和麥克阿瑟之外，信件中接觸得最多的題目是關於處置戰爭罪犯的。偶然也有一個辯護者抗議皇家或木戶伯爵的無罪。但是絕大部份是贊成審判的。不可避免的提出責難的題目是糧食和配給（他們要求多一點），日本的官僚政治（他們要求少一點）把親屬從西伯利亞或海外的俘虜營中送回家裏來，修訂選舉法案和教育法案，控訴日本警察。沒有責難意味的也有很多建議：廢除妓院和節制生育；用傘給美國兵做紀念品；使棒球及美式足球到處流行；撤銷言論自由，因為日本尚無此項準備；改變靠左走的駕駛；調查政府所宣佈的建築寬馬路的計劃，因為這祇是「盲目於另一次戰爭」。

處理麥克阿瑟信箱的人特別注意女人的來信。從她們的來信中得到一種表示，日本正在嚴正地接受一種指導，使女性的地位平等化。他們很驚奇有許多婦女都建議麥克阿瑟生一個日美混血的孩子。有一個自稱是女記者的說，她祝福麥克阿瑟的健康，接下去說：「由於宣傳，寫信人曾經以為美國兵是野蠻的，但，正相反，我發現他們是舉止大方的。她誠懇地讚揚此事，並且要求美國兵盡可能的多住些日子。」

另外一個女寫信人自認：

麥克阿瑟將軍：

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傾心的男人。如果在日本我給陸相寫信，他連看都不會一看，這是白費事的。天皇必定會憐恤我們；但，他是高高在上，和我們是不接近的。我給他寫信，他就永遠不會讀到；他的臣下會撕掉它、丟掉它，理由是太麻煩了，我知道。

結束這封信之前，我衷心地高興支持你和你在日本的工作。你辦得很好，現在你正在得到日本人民的信仰，不祇是男人而且也有女人。我要向你致衷心鼓勵之意。「少用棍子就會害了孩子」；現在日本正是一個過民主生活的孩子，你看。

希望你永遠健康，請向麥克阿瑟夫人致送我最大的敬愛。

你的誠懇的唐澤 Kazuji 上

二 無理的新聞檢查

一年多以來在這些信中表示了尊敬與諂媚之後，少數日本知識份子開始有了憂慮。麥克阿瑟的神秘變得如此強烈，至少在城鎮中，正在與天皇的神秘互爭雄長。一個叫輕葦的記者寫了一本理想化麥克阿瑟的傳記，賣了差不多一百萬冊。作者收到許多來信感謝他的這本「光榮的」書；許多來信稱麥克阿瑟為「活神」，為「神武天皇的化身」。

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東京時事新報的一個編輯寫了一篇社論警告日本人民的不相信麥克阿瑟是活神。延擱了一個星期，這篇社論被盟總新聞檢查所通過了，這篇文章到十月十一日登了出來。日本時報是日本外務省控制的英文報紙，也是現在佔領軍的主要

讀物，該報贊同時事新報那篇社論的意見，準備予以轉載，並且再加上一點適當的評論。社論版送交檢查所，通過了。該報開始印刷以後，佔領軍官員趕到印刷廠裏來，把所有的報紙都沒收了。

麥克阿瑟官員決定禁止露佈的日本時報上的幾段文章是這樣的：

現在少數日本人必須重新估量一下希特勒是比拿破倫偉大的人物。許多人還在希望一個希特勒會在日本人之間出現。可以這樣保證，今天許多日本人正在希望麥克阿瑟將軍掌握國家的領導權。

必須着重指出，除非以及直到日本人清除了這種奴隸的觀念，民主在日本是不會有進展的。祇有一個國家以足夠的內容開闢他自己的命運，才能夠建立一個民主政府以及順利地工作。民主化過程的第一步必須清除這個國家英雄崇拜的習慣，這是在過去廿世紀中浸潤了（日本人）頭腦的。

下級官員在這篇對日本人民的警告中發現沒有什麼「危險」，但管理盟總情報及其檢查所的魏羅貝（C. A. Willoughby）將軍並不喜歡他。他帶了一隊憲兵趕到日本時報倒塌了的印刷廠裏去，停止了印刷，又派人去取回裝上火車和卡車上的已經印好的報紙。魏洛貝嚴正地說：「佔領當局必須加以保護，不受記者們的批評。這篇文章是沒有趣味的。」自巴丹戰役以來，魏洛貝就是麥克阿瑟部下掌管情報的第二科科長。

偉人的不犯錯誤，是麥克阿瑟的佔領所依恃的一種決斷的規則。此外，還要大大地憑依民主編訂的教條。當兩個人衝突的時候，常常可以發現民主的釋義和韌性，是比偉人的職權，有更多解釋的餘地的。一九四六年五月，在糧食危機之中，一個叫做松島末次郎的發怒的日本人相信他已經聽見過言論的自由了，就在一張報紙上畫了一張裕仁的漫畫。畫上描寫天皇大吃大喝，而別的日本人却正在挨餓。松島因叛逆罪而被捕。

這次事件對於第一大廈裏的智囊團也不甚以為然，特別是報紙上發表了捕人的消息之後。如果裕仁是一個民主的天皇，就不應該有叛逆罪這種事情。麥克阿瑟的律師和日本法官商談這次事件。松島因「譏謗罪」而被判決徒刑八個月。這樣的處罰好像是不大嚴厲的；那些幾年以來天天「譏謗」美國人的同盟社的許多主持人，在佔領開始以後非祇幾個月，都還在東京自由地往來。但，「當局」是必須加以保護的。後來裕仁赦免了松島。但，這件新的成例是建樹在日本人的頭腦裏去了。他們這樣認識：「美國人不管這叫叛逆罪，這祇是謗謗。」（日本從來沒有過關於譏謗的法律。）

一年以後，日本人又受到了盟總保護當局的一個挫折行動。佔領初期，美國兵曾經上演過獨幕歌劇「御門」（註二），從前在日本是被禁演的。但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一家日本公司準備第一次上演這齣音樂諷刺劇的時候，盟總就出面代為禁止上演，以保

護天皇和皇族。

麥克阿瑟的檢查施予美國報紙的也和對日本人的同樣待遇。東京版的星條報曾經爲了「否定忠誠的叱責」而撤銷了兩個人，一個人曾經在西班牙政府軍方面（註三）作過戰，另一個人曾經編輯過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的報紙。星條報不許登載對糧食大感頭痛的四十四個美國兵的投書。事實上該報也不准登載佔領軍自己官員的報告；祇是採用一些在日本以外編好了的電報而已。

雖然言論自由是要在日本實行的目標，還是很少人願意允許日本報紙享有無限制的自由，以攻擊佔領。實行檢查是出於道德和安全的理由。但是，已有的紀錄指明，麥克阿瑟通過他的檢查制度，運用他的職權對付日本報紙，其理由是在佔領的進展之外的。有的時候，這些理由是有政治意義的，有的時候這些理由祇是代表個人的偏見而已。

發自美國以及日本的新聞遭到這干涉的例子是很多的。華萊士致杜魯門總統書以及隨後的演說在東京被檢扣了四十八小時。當這些東西最後放行的時候，都被割成碎片

（註二）御門包括天皇、宮廷等等含意，此處係指天皇。

（註三）這是指西班牙內戰期間被佛朗哥叛軍推翻的政府軍。

了，這些鬧糊塗了的日本記者祇得寫一篇「解釋性的」文字，再也不能寫成新聞了。

一九四七年元旦日，美國產業職工大會主席茂萊（P. Murry）向日本勞工致賀辭，就被盟總按照它自己的理由檢查了一過。下面是茂萊的信，括號裏面的字句是被扣掉的：

我很高興從美國產業職工大會這裏向日本勞工致書。世界上的工人有許多的事情都是共同的，大家都（反對戰前黑暗期的獨裁政治）尋求和平、安全與職業。產業職工大會相信世界和平，並且信賴整個世界上的工人的合作。通過世界職工聯合會，這種合作是可能的。（我熱切地希望日本工人派遣代表參加這個民主工人聯合會的戰鬥組織的日子會趕快到來。在美國佔領軍勞動局裏有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的會員，還有別的會員在幫助改革日本的教育制度。這些人都讚揚渴慕民主的日本羣衆。）

紐約時報記者克蘭（B. Crane）考察了六十條被盟總檢查過的新聞，發現「祇有兩三條好像是違反出版法的」，出版法是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公佈的。該法規定發表新聞要真實、不許渲染、禁止足以擾亂社會安寧的東西、或批評盟國、或導引「不信或憤恨」佔領軍。

由於濫用，檢查制度比無限制的許可已經差不多變成了更大的壞事。日本人民不知道盟總安排他們的將來是有多大的一隻手；他們不知道佔領的代價；他們不知道賠償的

最後計畫。這種對事實的忽視養成了謠言，這些謠言比直接報道常常是更能「同樣的擾亂社會安寧的」。謠言也吹乾了用於反對盟國的未來日本爆炸物的藥粉；也確實會對未來的狂熱者供給了軍火，他們會對日本人民「揭穿」他們是怎樣接收的。

三 對美國記者的壓迫

做爲世界上最壞的宣傳員式的將軍，麥克阿瑟有兩件不幸。在太平洋上長期作戰之時，他與新聞界麻煩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公報維持着少數傷亡數字的神秘，公報把麥克阿瑟的名字保留在報端，檢查官忙於檢扣反映麥克阿瑟所放行的新聞中的真相或他的將才的任何東西。這些事情可以拿戰時的需要而加以原諒，但濫用並沒有和戰爭一同結束。美國在太平洋得到勝利的那天，他的新聞聯絡官把所有的海軍廣播器都攔滿在地上，說「這是總司令的日子」。他們拒絕允許金開德將軍的紀錄講演播往空中。他們的解釋是「這一天不能說到貶抑總司令的個人名望或光榮的話。」

作爲對這些工作的獎勵，在麥克阿瑟的四十名檢查官和新聞聯絡官中有三十七人得到獎狀。在大部作戰期間，麥克阿瑟的新聞聯絡組主任狄勒（A. L. Diller）少將告訴他那組的職員道：「謝謝你們幫忙我完成我的目標，看見麥克阿瑟將軍在太平洋上得到

一切的尊榮，並且確實辦到他被任命為最高統帥了。」

當佔領初期狄勒離開日本的時候，麥克阿瑟這一羣人的大言不慚的傳教士這個職務，由矮胖的貝克（F. Baker）少將接充了。新聞記者們都感覺到貝克之下新聞的情形會好一點了。他們這作記者的人，天天要把總部放行的新聞重寫一遍。當堅忍的新聞記者們開始挖掘有關佔領的未發表新聞的時候，當他們發現指導與實行之間有極大差別的時候，貝克急忙地給麥克阿瑟造起防禦物來。各組主任沒有總部的許可，就拒絕和記者們談話。英美記者們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向貝克提出了抗議。他似乎還不知道這些大驚小怪是爲了些什麼事情。

忙碌而龐大的新聞聯絡組保持它自己以及麥克阿瑟，都靈通於記者們對於老人（註四）和佔領說了些什麼好事，什麼是善於批評的。一批新聞和有所「增減」的評論每天從華盛頓的陸軍部拍給東京。當一個有所「減」的記者離開日本到中國去旅行或假期歸國的時候，他常常發現會難於重回日本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皮爾遜（D. Pearson）發表了一段新聞，說麥克阿瑟給

（註四）老人是指麥克阿瑟。

陸軍部拍了一個電報宣佈他並不歡迎不利於他的佔領的若干報紙的代表前來日本。陸軍部會圓通地建議組織一個像是在德國實行過那樣的記者團。據皮爾遜所說，麥克阿瑟拍回去的電報是這樣的：

對於陸軍部所主張的籌劃組織記者團的好意，我還是在繼續我的懷疑的時候，我撤回我的反對。我希望有一個機會在完成邀請之前決定這個籌劃中的選擇。

我相信，在名單中不應該包括現任的作家，但，應該限於發行人和編輯，不應該包括對佔領採取敵意的那些報紙的人們。

像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紐約先鋒論壇報、芝加哥太陽報、舊金山紀事報、紐約下午報、工人日報等等及其同類的報紙，那上面的文章和社論不祇是偏向的，而且是近於完全吹牛和不誠實的。

熟習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紐約先鋒論壇報和舊金山紀事報的保守的共和黨政策的人們，對於這種辱罵會大感驚異。還有奇怪的相互符合的事情，自停戰以來就在麥克阿瑟戰區的那些能幹的、不怕事的和獨立的記者們正是這些報紙的代表。先鋒論壇報記者凱萊 (F. Kelley) 卓越地詳述過麥克阿瑟之下濫用檢查制度的情形；基督教箴言報的華克爾 (G. Walker) 對於佔領的優點與劣點拍發過許多敏銳分析的電報。當他打算從另一個國家回到日本的時候，他的護照被麥克阿瑟扣住了。他的唯一的罪過是寫劣點和優

點一樣「缺乏愛國心」。

當重要的編輯和發行人被招待在日本的宴會中晤及麥克阿瑟的時候，他常常向他們保證在日本的盟國記者是有完全的言論自由的。許多英美記者都不相信這是真的，如果麥克阿瑟相信，那一定是他的官員把事實對他「蒙混」住了。

一九四七年春天，紐約郵報記者馬丁（R. P. Martin）回到日本來辦點死於東京的泰（D. Tiche）的善後。馬丁是一個遠東方面的最敏銳的記者，自然要給他的報紙拍發新聞。在他拍發電報五個星期之後，盟總突然讓他在廿四小時以後登上一架飛往上海的飛機，因為在技術的觀點上，他的進入日本不是來當記者的。駐在東京的其他記者全體一致地向麥克阿瑟總部提出抗議，在最後一刻，馬丁的職位才予以改變，他被允准留了下來。記者們威脅地要寫一段關於「言論自由」的大事件，盟總屈服了，雖然陸軍部老早拍來過一個電報，指明馬丁是一個被允准的記者，這事是被忽略了。

馬丁寫到這次事件，他相信此次對付他的企圖是因為他對於佔領的若干情形，寫過有評斷性的新聞。他也報道過盟總曾經警告日本官員不許和盟國記者談話，有五個記者曾經被威脅要實行軍法裁判，如果他們要寫某些新聞，還有另一個人得到通知他要受軍事審判，如果他不發表他的情報的來源。

還有幾次盟總對外聯絡組官員干涉新聞自由的事情，他們拍電報給國內的機關，要求一個記者的電報不要發表，或者建議把犯規的記者從該戰區撤回國去。據馬丁說，這件被牽涉的大事已不再是陶格拉斯·麥克阿瑟個人的光榮了。這事件對於美國人民是更重要的。在馬丁得到重新任命之後，他拍的電報寫道：「現在盟總的對外政策是要說服美國，日本的民主化已經得到空前的成功，日本政府已經自願地把這程序推進了一步。第一點說法是值得討論的，第二點是與事實相反的。」

在「馬丁事件」以後不久，盟總又趕走了另一個記者。當我在日本的時候，康德（D. Conde）是盟總電影組主任，正在努力工作幫助日本人發展他們電影中的民主題材。後來他又當了記者，九個月以來他給國際新聞社和英國路透社寫新聞。一九四七年初，他在聖路易郵傳報上寫了一篇具名的文章，批評了盟總檢查日本報紙的情形；在「遠東觀覽」（Far Eastern Survey）上，他發表一文，揭露吉田內閣對在日本的朝鮮少數民族處理失當的情形。他雖然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請求到的記者許可證，他突然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得到通知他必須離去。東京記者俱樂部的會員又提出抗議，但是，他們祇要求等到康德向國務部提出籲請之前，允許他留在東京一點，也被拒絕了。

當麥克厄佛（D. McEvoy）創辦「讀者文摘」日本版的時候，決定在第一期上登

載一篇麥克阿瑟的側寫，這會是好生意和好政策。原先登在「科里爾」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送到貝克那裏去了。當貝克讀了那篇文章，他把麥克厄佛找來。泰然自若的貝克有一點中風似的。他說這篇文章是失敬，是對麥克阿瑟的一種侮辱。麥克厄佛堅認這篇文章的全部內容是有助於最高統帥的。

他們辯論了一會兒之後，顯然貝克反對該文引述的也是不可加以原諒的對麥克阿瑟任何的批評。麥克厄佛問道：「你以為必須百分之百的有利嗎？」貝文認為是的。

貝克和他的領袖一樣，相信對這位老人任何不誇讚的說法都是「玩俄國人的把戲」。所以，這篇描寫佔領情形的文章是不愛國、不忠誠，結果是叛逆的。

我也有同樣的一次經驗。等了一個長時間以後，貝克告訴我「老人左右的某些高級官員」已經勸告不要允許「生活」週刊寫一篇有關麥克阿瑟的文章。貝克解釋道：「時代」和「生活」曾經批評過這位將軍，所以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贊助魯斯（H. Luce）的刊物。我把這結果草擬了一封電報，拍給紐約辦事處，我又送交貝克，請他批准。他改了幾個字，使語氣和緩了一些。紐約辦事處裏把兩種雜誌施行一次廣泛的審查，實際上沒有發現什麼可以被認為是「批評」或不利於這位將軍的。當貝克知道了這種情形，他又說「老人」對於魯斯夫婦是極喜歡的，他建議或許還有最好的一個步驟，就是由他

倆之間的一人給麥克阿瑟拍來一封私人電報，請求允許「生活」寫篇文章。據我所知，從來沒有這麼辦過。

在我離開日本之前，貝克告訴我，他有一隻照像機，他自己能夠為「生活」拍攝需要的照片。我謝絕了他的好意。就在那一次，我問他，在我離開之前，能否排定一個時間，讓我訪問一次麥克阿瑟。貝克答道，老人或許太忙了，但到底可否，他會再告訴我。貝克從來沒有排定這個訪問。在我排定去朝鮮的前一天，通過麥克阿瑟的助手惠勒（H. B. Wheeler）上校的代為懇請，國家廣播公司的簡生（G. Janssen）和我達成了這次的訪問。

四 日本的辯護者

麥克阿瑟的辦公室在第一大廈的六層樓上，門上沒有什麼標識。我們經過一長串衛兵，走進一間擺着一張桌子和衣架的小前室，然後進入一間真正寬敞的、有冷氣的、鑲着胡桃木的辦公室，室內是飾以褐色的。麥克阿瑟將軍在一張清潔光亮的桌子後面踱來踱去。他比我想像的要更高大、更瘦削，他的頭髮很少。他的服裝是整齊的。惠勒上校介紹我們，他跨步向前，握手，說：「我很高興會見你們。」

麥克阿瑟示意我們應該坐在褐色的皮沙發上，他坐在一隻塞滿了的大皮圈手椅裏，惠勒出去了。他好像疲倦了。他的臉上有一種奇怪的緊張，雖然皮膚上擦了蠟膏。他不像是六十七歲的人。他一邊說話，他的手還在繼續動作，有時拿着他那慣用的粗大烟斗，修剪得整齊的手指顫抖着。神經質的緊張從未停止，而且越發這樣了。談話加重到某一點，他就跳出椅子來，向桌子那邊跨兩大步，拿起火柴匣，在頭上搖動出聲，像是揮舞指揮刀。他抓住我們的問題，這些問題好像是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他熱心地抓住了問題，不管是怎樣偶然問起的，然後他靠在椅背上，細細玩味。他把頭靠在後面，下巴突在前面，他要開始答話了，說出來的字句就好像是天上對於這個題目的最後宣言似的。要加重語氣，麥克阿瑟就使用一種不呼吸的雄辯，差不多在這裏低語一字，在那裏又引出一字，然後他又短促地抓住一句。那是有效的，至少一部份是如此。後來，我們兩人比較了一下我們的印象，我們發現我們兩人都認為麥克阿瑟說得更像一個教育家，而不是一個軍人。麥克阿瑟告訴簡生有一個讀賀拉西（Horace）之詩而大為興奮的大學校長（註五），當時我正在想像他是一個聖公會預備學校的校長。

這是一次比我們所預料的還更多的一次訪問。和他談話的大部時間裏，我們所聽到的是一幕迷惑的獨腳戲。我們老早就得到警告，唯一提出問題的時間是當將軍停止點烟

斗的時候。在那個時候，他雖然有點神經質，但還是高興說下去。他稱蘇聯爲「俄國熊」，稱中國爲「柴納門」（註六）。他對日本以及使日本民主化保持他的最偉大的雄辯。他以一種福音般的調子談到他的使命。這位曾經是反對日本人的最後壕塹的象徵者的人物，現在是他們的熱心的辯護者了。他好像完全相信了他們的謙恭之真誠。

在這次訪問中，我們沒有得到一點東西，麥克阿瑟從來也沒有告訴過別人什麼東西。他喜歡設立遠東委員會，但是他高興他們是要到日本來的，因爲他想着他可以給他們看到點好事情。他一次一次地告訴來訪者說日本是一個偉大的精神與經濟的真空，對於那些相信基督教民主和基督教堂的人們提供了一個無比的機會。他歡喜把他自己的使命分爲兩個明顯的階段：第一、政策的形成，第二、政策的執行。由於草成了新憲法，第一階段是完成了。麥克阿瑟承認美國還有一個重大的工作放在前面呢。要贏得日本人

（註五）賀拉西的全名是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生於紀元前六十五年，死於紀元前八年，是羅馬帝國黃金時代的大詩人，後人稱他爲最好的宣道者。

（註六）*Chinaman* 譯爲中國人，和 *Chinese* 一字一樣。但，美國人說 *Chinaman* 一字時，是帶有一點輕視之意的。

接受「民主觀念」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和平的觀念交付給日本人。麥克阿瑟承認「戰爭是一個失敗。我們必須廢除戰爭，同時還要保持原子彈。」另一次，他這樣觀察道：「必須不要再有一次戰爭。如果再有戰爭，失敗者不是唯一的失敗者——勝利者也將有所失敗。」

麥克阿瑟已經設計了他的想法，在不遠的那麼一天，那時日本就將重新加入國際家庭，成爲美國的朋友和盟國。因爲我們美國決定並不掃滅日本人，雖然我們也可以花相對低的代價去這麼辦，他相信我們必須幫助日本人生活下去。結果，日本必須從美國輸入糧食以及意識，必須允准輸出原料和若干製成品。他必須把日本人的能力和真誠一並提高，他同樣不喜歡任何計劃或和約，和約是會阻滯他們的進展的。

在談話之中，麥克阿瑟常常提到軍事佔領的期間爲「三年到五年」。他承認依照軍事管制的期間中的管制因素是有關美國對蘇關係的。他喜歡真空，如果美國人撤走得很快，他又預見了在日本的另一個真空，因爲接着「俄國人就要進來了」。談到蘇聯這個題目，他自由在地承認他很惋惜蘇聯的參加對日作戰。他相信，蘇聯人應該在巴丹戰役時參戰，否則就不要來了。

雖然他很少在公衆面前表示關於佔領之成功的任何重要的預示，但有一點也煩擾了

麥克阿瑟。這是與蘇聯或擔心英國「玩莫斯科的把戲」無關的。他有一個很大的贅疣，就是在表面的安靜之下，日本人正在燒毀他們的失敗，有這麼一天，他們就會起而反對他們的領袖和制度，甚至反對天皇，「除非我把他民主化一下。」和這個贅疣有關的，他還有一種感覺，就是有這麼一點，在這一點之上佔領軍就會失去它的用途。佔領軍會變成這個誠摯的日本人的「燒毀」的替罪羊。麥克阿瑟也承認在一個時期以後那個置身外國作藩王的會變得腐敗或被腐敗誘引了。他知道，他和「巴丹人物」是不會如此，但他對於美國兵就有懷疑。

他曾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東京記者俱樂部中發表談話，說是他熱切地要「儘速」與日本締結和約，以及由聯合國的非軍事的管制代替盟軍的佔領，他驚訝每個人（包括美國國務部）引述此事的時候，麥克阿瑟在他的腦子後面是還另有些事物的。

五 士兵們講說着的故事

由於教育和經驗，麥克阿瑟顯著地適宜於充當日本將軍這個尊崇的職位。從他的生涯一開始，就被成功的光芒啓發開來。一九〇三年，他從西點軍校畢業，他得到該校歷史上最高的分數。在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成爲美軍紀錄中最年青的師表。後來，他又

西點軍校最年青的監督和美軍最年青的參謀總長。在參謀總長職位中，他曾負責驅散了領獎金的退伍軍人，並且燒毀了他們在華盛頓的臨時帳蓬。一九三五年，他又到了遠東，三十年前他會和他的父親第一次旅行過這裏，麥克阿瑟被任命為菲軍元帥。在馬尼拉，他開始組成了一個緊密完整的、強烈忠實的參謀官員，其中許多人都跟着他很久。自從與優勢的日軍進行了插曲式的防禦戰以後，這一羣人以「巴丹人物」著稱了。

麥克阿瑟在太平洋上進行的戰爭對於未來的幾代人是無可爭論的話題。在最後分析之中，他的戰略和戰術證明是成功的，雖然並不像他的新聞代理人以及他的公報導使人所相信的那麼一個超人。在麥克阿瑟的優異之中，歷史差不多會當然地表示出他是被謠言所中傷，正是差不多如他被崇拜者奉為神明一樣。他的極端的虛浮，適宜於拍照的外形，分辨制服的本能，以及他的口才，使他成為惡意的漫畫和猛烈辱罵的明顯目標。對於赫斯特 (Hearst)，麥克考米克 (McCormick) 和柏特遜 (Patterson) 社論作者 (註七) 的話，他是不會錯的，對於在他指揮下的美國兵，以及指揮官都逃避着他的海軍陸戰隊的看法，他是不會聽的。太平洋的叢林中震響着關於偉人的麥克阿瑟的諷刺詩

(註七) 三個人都是美國報紙大王，在他們控制之下的言論都是極反動的。

歌。有一個被麥克阿瑟的華麗辭藻弄得煩惱了的瓜達唐納爾島水兵寫了一首疊韻詩：

現在可能還是謠言，

總有一天會成爲實在

主會聽見一個深沉的聲音說：

「去吧，上帝，我是老麥。」

今天，在日本，關於麥克阿瑟的故事和謠言，士兵們在熄燈之後，還是在傳來傳去。

他們說過，麥克阿瑟怎樣在第一個寒冷的佔領期間召見老年的幣原首相。幣原打算說話，但麥克阿瑟把他阻住，並且告訴他，他的政府最好趕快從關了門的礦廠中把煤弄出來。幣原還是要經由翻譯說點什麼話，但麥克阿瑟就從來沒有給他一個開口的機會，直到他站了起來，示意幣原應該走了。後來，幣原請翻譯向將軍道歉，因爲幣原祇穿了一身非正式的短衣，還要解釋一下他沒有什麼衣服了。麥克阿瑟對翻譯狂吼道：「拿去！告訴他，他有這麼一件衣服就算是運氣了。」

他們說過，麥克阿瑟後來又怎樣發起慈悲來，當幣原患病的時候，將軍派人送去了盤尼西林和醫生。

他們說過，天皇的宮內大臣曾經怎樣的問過一個聯絡官，麥克阿瑟上代的許多祖母

中是否有一個是日本人。當告訴他沒有這麼一會事兒的時候，宮內大臣憂鬱地搖了搖頭，說道：「我們在宮裏人奇怪得很，因為祇有有日本血統的人，才能對皇族有這樣良好的態度。」

他們說過，俄國人曾經怎樣計劃着要像英國和其他盟國一樣，派一支象徵的佔領軍進駐日本。但是，當俄國人要求在極北的北海道登陸的時候，老人吼叫道：「這不行！如果那些壞紅軍要進來，倘若有了戰爭，我們就要把軍隊駐在他們與他們的本國基地之間！」他們說，這就是俄國沒有來的原因。

他們說過，當風從第一大廈吹過二重橋到達皇宮的時候，麥克阿瑟可以從六層樓辦公室窗戶裏走出來，並且可以渡過二重橋下的水。

他們說過，麥克阿瑟怎樣接見第一次選入戰後議會的婦女，他用漂亮的演說引誘她們，熱烈地握手。他們說過，另一次，向他獻花的幾個日本婦女在他面前低跪下來，他站起來招呼，對他們說：「在一個民主國裏，我們不對任何人鞠躬。」

他們說過，麥克阿瑟曾經下令，保護他的憲兵必須特別挑選漂亮和魁梧的，這樣才好感服日本人。

他們說過，盟總是怎樣的最有權力和最有影響的現存的美國人，因為甚至內政部長

都不顧麥克阿瑟的上司陸軍部長，飛到東京來，向麥克阿瑟請教關於太平洋各島上行政的看法。

他們說過，麥克阿瑟曾經一次又一次地告訴遠東委員會、陸軍部、國務部、甚至總統，要他們怎樣依照他們的訓令辦事。

他們說過，艾森豪威爾將軍怎樣在一次記者招待會被人問到是否認識麥克阿瑟，他說，他曾經在菲律賓花了四年跟着他研究戲劇。

他們很少以善意說到他們的領導。他們的善意是保留給艾契堡(R. Eichelberger)中將的，他是高大的、坦白的、友好的駐日本第八軍軍長。

許多在戰爭期間從來沒有在麥克阿瑟之下服務過的接替者，並不像戰鬥部隊那樣，對總司令冷嘲熱諷。很少有幾個人不在某一時間內參加熱心的日本羣衆之中，每天等在第一大廈外面，獲得一瞥將軍的機會。有些人憤恨他的漠然無情，他對美國兵的顯然不關切，以及他過得比較奢侈的這種事實。但，這也不過是工廠工人對工廠老闆那種普通的感覺。許多軍人相信麥克阿瑟的態度和生活方式，對於佔領是在心理上有價值的。

六 一批離職的官員

最高統帥和他的安詳而美麗的妻子，以及他們的嬌嫩的十歲的兒子阿瑟，住在一座山頂的美國大使館裏。這一片館址中有四座疏落的、屋子很多的建築物，是在一九三〇年花了很多的錢建築起來，要以美國的高貴來感服日本人的。館址圍以高大的白色堅固牆壁，進口處有一個鐵門，由魁梧的憲兵守衛着。

將軍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家裏。他每天去兩次辦公室，從上午十一點到下午兩點半，下午從五點到八點。他差不多從來不參加外交集會，他寧可和小兒子玩，以及聽人朗讀古典文學，以度閒暇。他從來沒有在日本人的公開儀式中出現過。他到了東京以後，祇出去過一次；那次是他從厚木機場飛往馬尼拉，去慶賀菲律賓的獨立。在大部份日本人看來，他是和戰前的裕仁一樣的傲慢和漠然無情的。

麥克阿瑟夫人對於丈夫的領導工作是一個華美的陪襯。當有客人的時候，她是一個動人的談話家，直等到她的丈夫的出現。接下去，她便不大說話了，除非是要和他出去了——這是很少有的。一個和麥克阿瑟夫婦相處了一會兒的美國外交官對我說道：「她寧可是杜魯門夫人，而不是羅斯福夫人。她寧可含混一點而不增加一點，你懂得我的意思吧。」

在過去一年中，麥克阿瑟夫人已經花了不少精力來重新裝飾大使館，把前大使格魯

及其夫人所留下的東西一一擺好。在麥克阿瑟的那間寬敞的客廳裏的爐台上，是一幅華貴的彩色壁飾，這是麥克阿瑟夫人設計的，一個叫 Ohi 的日本人製作的。她已經學了一些關於日本花飾的藝術，每天要花半小時來安排那些致敬者所送來的花球。

麥克阿瑟夫婦很少有正式的招宴，但是，甚至有一個訪客偶然被邀吃午餐或晚餐，也會被在麥克阿瑟家中經常與吃飯相伴的莊嚴的華麗與協和的環境所感服。一個旅行到這裏來的國會議員從鐵門走到客廳，軟軟地在絨氈走了一半之後，說：「喂，這是東方的華麗啊。」後來，麥克阿瑟夫人很有禮貌地告訴他，這個大使館是胡佛總統時代建築的。

在莊嚴的長餐室中，點着尖細的蠟燭，有八個訓練得很好的日本人在伺候着，據說這是「有趣的、實在的、而不是華貴的。」日本人都穿着黑色的寬外衣，上面飾以白色的美國國徽。將軍常常要等每一人都坐好在桌旁才出現，夫人就解釋道，他剛在「休息」。

將軍小心謹慎地吃得很少。他不大作運動，但，他的健康是好的。他的醫生肯德利克 (D. B. Kendrick) 上校給他施行過一次正式檢查，發現雖然麥克阿瑟已經是六十七歲了，「他的思想反射和像貌還像是一個五十歲的人。」一九四七年五月，嘲笑將軍

將因不良的健康而退休的謠言，肯德利克宣稱：「將軍是健康的，好像在生理上差不多是不可毀滅的。比起佔領時期的任何時間來，現在，他看像是更年青，身體是更好了，雖然他一個星期有七天，一天有十小時的工作。」

在他的毫無戲劇意味的家庭生活中，好像有些線索可以知道是些什麼使得麥克阿瑟有威嚴與荒謬的奇異混合體。研究一下他過去聲明和成就，他的缺點與成功，人們要被吸引來比較一下他和近代美國歷史上的兩個著名人物。麥克阿瑟逐漸地表示了他是老羅斯福（T. Roosevelt）政治思想和羅斯福（F. D. Roosevelt）政治光焰的混合體。和兩個羅斯福一樣，麥克阿瑟已經引起了熱情的貢獻和幻想的敵意。他已經表現他們兩人的特性，使所有的戰鬥，甚至語言的戰鬥，都好像是戲劇性的。他是一個熱心的和無畏的國家主義者，像老羅斯福那種跋扈的親美派一樣。他把國家看作是權力政治的迷人的遊戲中的小卒。他以過份重視的種族特徵來歸類以及常常詆譭各族人民。他認為他自己是一個「開明的保守派」——並不要革命化政府，而是要免除其濫用。他還有一點像老羅斯福，他個人的英勇，他在他自己權力上的決斷，已經幫助他贏得了他領導下的人們對他的尊敬。

羅斯福的朋友會是第一個（麥克阿瑟的朋友會是第二個）否認此點的，然而，將軍

已經追蹤了已故的偉大總統的若干優點與缺點。愉悅的態度是羅斯福令人不忘的態度。這樣，難得的能力會使一個聽衆感覺到她或他是得到了一種特別的談話的能力。他們兩人對朋友和助手都能保持強烈的個人的忠誠，甚至當那些人不再盡他們自己的本分的時候，還是把他們保留在高位上。最重要的是麥克阿瑟像羅斯福一樣，有用耳朵辦事的天賦能力；還有，主人的選擇時機，在公共場所出現，以及在適宜的時機運用可以遍傳的句子。麥克阿瑟的歷史性的名句「我已經回來了——」不會在距離羅斯福的令人不忘的名句「我痛恨——」太遠的歷史篇章上震響。

麥克阿瑟的朋友相信他是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在他的歷史紀錄上，沒有一件事情像盟總這樣沾污這種主張了。在大問題上，他已經表現了一個人在對付小的互訐上的優點。沒有人否認他的龐大的智力和能力，足以調和抵觸意見的混亂，研究它，並且得出結論。有一次，他達成了決定，他也有其他偉人的弱點；他常常堅執，以至走得太遠。譬如，關於處置吉田首相的日本政府一事，盟總決定不要使用嚴格的管制讓吉田在無論任何的情形下，試圖去復興國家的經濟。在東京或華盛頓的部下提出不少的勸告也不能勸住麥克阿瑟改變這種立場，直到真的到了最後關頭。

他讚佩偉大的人物，甚至讚佩並不同意他們的理論的那些人。在聖經之外，他常常

提到各種方面的人物，如孔子、亞歷山大大帝、拿破倫和吉卜林(R. Kipling)(註八)。他並不提及馬歇爾將軍和艾森豪威爾將軍。他並不同情羅斯福總統的社會與經濟的綱領，但他對於杜魯門却有「更多的同情」。總統非禱一次隨帶邀請麥克阿瑟回國享受一次「英雄歡迎式」，但，將軍却寧肯留在職位上，直到他這部份工作可以認為是「完成了」。然而，他曾經說過，當他回到美國的時候，他要住到度過童年的密爾窩基(Milwaukee)城去(註九)。

雖然，在一九四七年春天，一個「麥克阿瑟競選總統俱樂部」又在威士康辛成立了，如果麥克阿瑟曾經有過這種意思，現在却不再有進白宮的慾望了。年紀大是一個理由。另一個理由，甚至他最接近的助手也承認，他是永遠不能忍受那熱烈的競選運動的。將軍在長時期以來，已經在軍隊中有了高位職，對於批評，他是不能予以適宜地反應的，

(註八) 亞歷山大大帝爲馬其頓國王，生於紀元前三百五十六年，死於三百二十三年，曾出征波斯、埃及等地。吉卜林是英國作家，於一八六五年生於印度，所著短篇小說甚多。

(註九) 密爾窩基在密其干湖西岸，是麥克阿瑟的故鄉。

即使是應得的批評。

麥克阿瑟有一種想像力，也有果斷力。有一個時期，他籌劃着要當「第一個國防最高統帥」，這是比海陸軍高級指揮官更高高在上的的一個職位。後來，他說過還是留在日本當第一個「聯合國總督」。但是，再後來，他又像邱吉爾一樣，巴望着有這麼一天，當他能够部份地退休的時候，寫他的回憶錄。最重要的，是在世界還有幾個比盟軍最高統帥還要更高的職位，但更少有人能有更多的完全的威權。麥克阿瑟有一次這樣觀察道：「這是戰神送給一個老武士的最後的禮物。」

與麥克阿瑟的意見在任何方式下有所不同的許多軍官和高級文官老早已經離職，或者被調充不重要的職位。他們的離職有許多理由，有的因為他們未被提陞，有的因為他們「屈居」較下的職位，另外的因為他們感覺到他們不能作一種忠實的職務。

今天，在麥克阿瑟擔任盟軍最高統帥之下，共有三個主要的特別的部門，向日本政府「建議」要日本去怎樣辦的。各部門的高級人員是由專家來充當的，他們的經驗都很適合於他們的工作。政府組主任是承繼克萊斯特（W. E. Crist）少將的惠特尼（C. Whitney）少將。這位從前在陸軍部任參謀長的能幹的軍官曾被訓練來接管在日本的軍政府的行政工作。事實上，他曾在琉球擔任過這種職務。在佔領開始以後，麥克阿瑟決

定要如在別的佔領國中所進行的，要如陸軍部給日本所計劃的，那樣建立起來的標準軍政府，就不能和他個人領導的觀念平滑地接觸。在總部裏著名的克萊斯特不是一個「隊員」——意思就是說不是麥克阿瑟的人。他也未曾在巴丹作過戰。

惠特尼是一個薄嘴皮、圓臉、有着紅棕色鬍鬚的拘謹的人，戰前他在馬尼拉當律師，就認識了麥克阿瑟。珍珠港事件的時候，他在美國。他受命並被派往澳洲，在這裏他參加了麥克阿瑟的工作，作總部菲律賓組的親信的首要。現在，他的作威作福的辦公室就在那座前保險公司大廈第六層麥克阿瑟辦公室的隔壁，大廈是在東京的總部和盟總的神經中樞。

原任重要的經濟與科學組主任是克拉瑪 (R. C. Kramer) 上校。這個龐大而範圍廣泛的一組掌管勞工、財政、獨佔事業、科學研究、以及十餘種其它問題。克拉瑪是一個敏銳的分析家，也是一個有有關經濟的實際知識的成功商人，他開始了他的工作，以分解日本的獨佔事業和改組國家的經濟與商務機構。他在克萊斯特以後不久也離職了，理由或許不是因為他的重大的主動性和精力，而是由於這種事實，他不是一個正規的軍官，也不是一個圈內人物。幾次提名可以陞為將級了，克拉瑪無論如何都沒有這麼辦，在完成工作之前，也沒有退回到私生活上去。繼任的是馬奎特 (W. F. Margat) 少將，

一個愉快的矮胖子，他誇耀着他的鬚鬚和扁平的短髮，曾在巴丹任麥克阿瑟部下的防空專家。在他的工作上，可以這麼說，他是完全忠實的，對於任何經濟的知識，他也沒有自負。在他部下，有許多有才能的軍官和文官。

在佔領的最初半年，情報與教育組是由狄克 (K. R. Dyke) 少將很好地領導着的，他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廣告與無線電經理人。這一組的地址是在距離盟總不遠的東京廣播大廈裏，管理日本的報紙、無線電和電影、以及學校、藝術和宗教。當狄克回國擔任國家廣播公司副經理的時候，巴丹人物都很歡喜看到他的回國。狄克堅持主張左派出版物應該和較保守的報紙同樣可以要求得新聞和白報紙，這在麥克阿瑟人員的眼中，就把他看成是激烈派了。另一組的某主任，讓總部大家都知道狄克是被認為「粉紅色的」，赤色份子已經混進了狄克的那一組。從前的他的一個助手努金特 (D. R. Nugent) 海軍中校剛剛接上了任，就在這一組裏整肅掉許多自由份子以及若干早已被監視了的真正赤色份子。努金特很能執行命令，但很少建議或主動。

至少還有五六個其他重要而能幹的官員已經被淘汰或被批准回國。現在，麥克阿瑟的這架機器油潤得這麼好，嚙合得這麼好，來訪的報紙發行人、國會議員、教育家、或牧師就祇能大為感服全體一致所能帶出來的平穩的效率了。如果說盟總的所有官員都是

「唯唯諾諾之人」，就是誇張了。但，沒有一個人敢有勇氣在主要問題上和麥克阿瑟爭論得太久。當一個重要的決定要作出的時候，他請該組主任提供一兩點意見。有時，麥克阿瑟召見準備好相反意見的官員。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之後，他作最後決定。這種分工合作使每一個人都歡喜，除非是或許某人起草一道訓令，而是以麥克阿瑟的名義頒發的。然而，沒有一個人和老闆吵嘴，部下們都樂觀地感覺到加重他們覺得對的一些意見，麥克阿瑟是能够被影響的。

並不是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在這種態度中編發出去的，並不是所有的文件都用麥克阿瑟的名義。許多對日本的最好的基本思想是國務部辦出來的。但是，所有盟國的執行辦法，却是牢固地在盟總之下的，日本政府所頒發的重要公告也是如此。將軍引以為最大光榮的一個文件是可以測知的，在工作紀錄上，這是一個日本人的草根式的創造物，是一個迅速轉化為民主思想而不是行動的光輝獎狀。這部文件就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生效的日本憲法，其中包括該國廢止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之工具的一條。

麥克阿瑟在對我們的談話中結論道：「諸位，那是一個史詩式的觀念，你們不能阻止一種觀念的力量。你們可以阻止任何戰爭機器，任仍軍隊。但是，你們不能阻止越滾越大的一種觀念的力量。諸位，和平就是這種觀念。」

譯後記

這本小冊子是美國記者勞台巴赫（R. E. Lauterbach）所著「危險來自東方」（*Danger From The East*）一書中日本部份的兩章。原書共分日本、朝鮮和中國三個部份。單把日本這部份完全譯出，篇幅實在相當鉅大；如果作一番四分五裂的刪節，也不是我們出版界所應當提倡的風氣。爲了給讀者提供一點關於日本問題的資料，我選擇了有代表性的兩章，就是這本「麥帥陛下」。

勞台巴赫是「生活」週刊駐遠東記者，完成了遠東工作之後，他在哈佛大學讀書期間寫成了這本「危險來自東方」。所以，這本書是報道，也是研究。作者的觀點並不完全代表「生活」或「時代」的意見。

譯者認爲勞台巴赫所羅列的事實，並沒有蒙蔽真相，而且發掘了若干不爲人知的事實。祇是作者沒有把這些事實做正確的判斷，他沒有瞭解這是美國獨霸世界計劃的一部份，沒有指明這是華爾街有其必然的對日政策。所以，我們這裏的這本「麥帥陛下」也祇能是青年讀者的一本入門書。從這裏以及從勞台巴赫全書中去掌握全部日本問題，自然是不足的。

今天的情勢，是美國把日本當作了復興遠東的中心。正如美國要在歐洲復興西德以支配西歐一樣，美國是要在遠東復興日本以支配亞洲。對中國人民這是最大的危險。特別是在我國某些人士認為日本已經「民主」，認為麥克阿瑟對日政策並不寬大的影響下，我們實在有必要解脫出來，去面對事實、面對真理。

爲了讀者閱讀的方便，我在每節前面加了一個小標題。譯文祇刪去了無關緊要的幾句話。由於譯者對於日本問題還是一個小學生，錯誤是難免的。勞台巴赫對於日文也是外行，這也使我發現了幾個無法校正的日文名詞。文中有三處應該寫爲日本片假名的，由於鑄字不便，改寫英文。上下兩篇末後的幾個註，是譯者註。

對於在日文方面幫了大忙的朋友，我應該深致謝意。

一九四八年二月九日。

聯營新書
13



基
本
定
價
一
元
九
角